

• 人物 •

科学情结 人文关怀

——访卞毓麟

尹传红

卞毓麟简介

天文学家、科普作家。1943年生于上海市，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曾于1988年至1990年在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1998年4月起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权部主任、编审。现任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

著译图书20余部，主编和参编图书100多种，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科普和科学文化类作品500多篇。曾受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中国科普作协表彰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中国天文学会表彰为“优秀天文科普工作者”，北京市表彰为“北京市先进科普工作者”。2001年获第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

“改换门庭”

尹传红 卞老师，从天文学家到科普编辑——年过半百的您在从事科研工作30多年后突然“改换门庭”。这在1998年的春天，在科普界和出版界都是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后来也不时地为一些报刊所提及。我记得，1999年《文汇报》曾登过一篇醒目的报道：《上海科教社创一流科普出版基地/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南下加盟》。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8年了！

卞毓麟 是啊，那一年我55岁，当时就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是：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中国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还太少，我投身科教出版事业，志在将更多优秀作者的作品推向社会，传送到读者手中。我还讲了一个小故事：

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快到峰顶时，被狂风刮走，从此失踪。在他开始登山之前，有一位女士问：你为什么非要爬那座山不可？探险家说：“因为它在那儿。”同样，科普出版事业就“在那儿”，就是要人去干。

尹传红 一个科班出身的天文学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厚的“科普情结”？为什么甘愿长年奔忙于科普？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为科普宣传“摇旗呐喊”？我和读者朋友们都很想知道：在这方面，您究竟有着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卞毓麟 套用一句老话，那真是“说来话长”了。

“梦天”

尹传红 8年前，湖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



卞毓麟在《科学与公众论坛》上讲演
 (2001年12月15日,北京)

《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系列丛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在先行出版的30余种图书中,有您的一部《梦天集》。这书名一如您写的科学文化作品,读来让人感到挺有诗意。我还知道,您有一个笔名叫“梦天”,这背后可有什么故事?

卞毓麟 我最初用这个笔名,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宇宙中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令人神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从幼时就爱上了满天的星星,爱上了繁星密布的天穹,这是一种非常纯朴、非常自然的感情。从童年时代开始,朦朦胧胧之中,我渐渐明白了:研究星星和宇宙的科学就是天文学,而天文学家就是专门探索宇宙奥秘的人。可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从哪一本书上第一次学到了最初的天文知识。不过,我依稀记得,还在上小学以前,父母亲就给我买了许多好看的书,它们都是《幼童文库》的成员。

尹传红 这么说,您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天文科普了?

卞毓麟 这只能算是“启蒙”吧,真正的喜欢是在后来。1956年,正当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家们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还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普工作积极分子大会。这一时期,全国上下学科学的气氛很浓,科普书刊比以前更多了。我看了不少天文通俗读物,并且常常为之着迷。

尹传红 那时候的天文科普活动好像很受

重视,也很活跃。我听李元先生说,1955年6月30日发生日食时,北京古观象台上专门架设了天文望远镜进行实地观测,著名天文学家陈遵妫等亲临现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观象台上架设了专线,由著名播音员夏青等向全国直播,还有美术家当场写生……这在当时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学生,达到了很好的科普效果。

卞毓麟 那会儿我在上海念初中,自然而然地,我开始学习认星星了。其实,借助于合适的星图,认星并不难,但是必须有恒心,这是走上“通天之路”的第一步。高中时代,我对数学最着迷。可我想,假如高考志愿首选数学系,那么天文学就没人教我了;而如果我选择天文学,倒仍然和数学密切相关,因为天文专业本身就必须上许多数学课和物理课。所以,我最终的目标是选择天文学。刚好,那时南京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天文专业就属于同一个系,于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结果被录取了。

尹传红 这下,您的两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真是幸运啊!我想,兴趣、志向加上学习的主动性,一定对您的事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卞毓麟 我看这大概是普遍规律,因而不难理解。但是,我始终觉得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道德。康德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觉得,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对于康德的这段话,较诸其他人理当有加倍深切的感受。所以,我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任版权部主任后,每来一位年轻同事,我都要和他们谈论一番“人重德才绩,学贵安专迷”的道理。就科普而言,我于1996年曾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短文《“科普道德”随想四则》,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科普作家只有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方能激情回荡,佳作迭出;成就卓著的科普人物,大多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而科普创作的态度,常常和创作者的动机直接相关。那些误人、坑人、甚至害人的‘作品’,往往出于动机不良之辈。只有将

科普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才能真正做到维护科学的尊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决意取得真经，便有路在脚下。”

尹传红 据我所知，天文界的老前辈戴文赛教授就是南大天文系的主任。戴教授还在各种场合做过许多次有关宇宙知识、天体演化的科普报告。当初他在大众天文社北京分社成立大会上作科普报告的开场白，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向听众提问：“今天是1952年4月20日，现在是下午2点30分。这两句话里有多少天文学问题呢？”

卞毓麟 这确实很有意思。我想，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力，戴先生写文章、作报告才能够举重若轻、化难为易，把问题讲清、讲透。我记得自己在大学四年级时写过一篇板报文章，介绍戴先生论述的“宇观”概念。后来有位老师看了，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材料。我告诉他，《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曾发表戴先生本人的文章“宇观的物质过程”，我仿佛只是做了一篇读书笔记。

尹传红 由此看来，大学时代您虽然没有介入科普创作，但戴先生的“两栖作战”却已经对您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是吗？

卞毓麟 也许可以这么说吧。1979年3月，戴先生在《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直认为，科学工作者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工作。”1个多月后，戴先生便与世长辞。1965年，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也成了一名专业天文工作者。我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也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科普作品。我非常赞成戴文赛先生的上述那一番话，我认为，它正是5个世纪以前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的另一段至理名言在今日的回响：“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星星”引领科普路

尹传红 在我国，天文学的普及工作一直

是科普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破除迷信、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都离不开天文知识的普及。听说早些时候您常常作天文方面的科普演讲，请问，反响如何？这算是您从事科普工作的开始吗？

卞毓麟 对于我的天文演讲，有一位地理老师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您讲的课很‘实惠’，有内容，听得懂，派用场。”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很不错了。至于现场效果，那与演讲人的口才和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可这并不是我的强项。所以说来惭愧，我的报告虽然会赢得掌声，却不能频频引来欢笑。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我1998年重返上海后，竟有不只一位老教师忆及1/4个世纪前听我讲演天文知识的那些往事。1976年是我加入天文工作队伍的第11个年头，也是我的“科普创作元年”。当时，我在南大天文系的同班同学方开文先生正在科学出版社的《科学实验》杂志做编辑。有一天，他约我为该刊写一篇科普文章，三四千字。我说了几个题目，方开文觉得不是太专就是太偏。最后，我向他介绍了黄道光的情况，他觉得还可以。这篇文章刊登在《科学实验》1976年第5期上。随后，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陆正华先生之约，我又写了一篇“哪颗星星最明亮？”，发表在《科学普及》1977年第5期上。我认为，较诸“黄道光”而言，这篇文章又有了一些进步。《科学普及》原本就是《科学画报》的班底，后来刊名又恢复为《科学画报》。

尹传红 虽然您从事科普创作起步时已过而立之年，但从1977年在《科学实验》杂志上分6次连载的2万余字长文《星星离我们多远》来看，您的科普创作视野开阔、起步不凡。

卞毓麟 谢谢您的夸奖！不过，我以为，“开阔”尚可说，“不凡”非我意。天文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宇宙，是宇宙间千变万化的天体。我愿意凭借自己掌握的天文知识，充当一名普通的向导，陪伴读者在宇宙中遨游。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未久，我那“应该写点什么”的思绪也从蛰伏中苏醒过来。撰写《星星离我们多远》一文，我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文章采用对话体，以利脉络分明；另外，还特

地配上以“牛郎织女”为始的28幅插图。

尹传红 这样的表现形式在今天真是太普通了，可在“文革”刚结束时却使人陡觉新意盎然。

卞毓麟 是的，这篇作品的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后来，在祝修恒、李元等学长的鼓励下，我将《星星离我们多远》增补改写成书，于1980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天文史家、科普作家刘金沂先生在一篇书评中提到，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说，这是近年来写得很好的一本书。北京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先生也评价说：作者用陈述科学故事的方式把历代天文学家创造“量天尺”的过程放到科学原理的叙述中，这样既介绍了科学知识又饶有兴味地衬托出历史人物和背景。他还称赞作品立意清新，铺叙合理，文笔流畅，“是近年来天文科普中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佳作。”1987年，《星星离我们多远》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尹传红 我特别欣赏这本书的“序曲”。我认为它十分引人入胜，读来顿觉意境高远、神清气爽，禁不住就要往下看个究竟。它应该算是您的代表作了吧？

卞毓麟 我很难说哪本书或哪篇文章该算自己的“代表作”，但《星星离我们多远》基本上反映了我的创作个性和理念。正如每个文学作家都有自己的美学观念、都有自己的个性那样，每一位科普作家也各有自己的偏爱。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最喜欢苏联的伊林，读过他的许多科普作品；从30来岁开始，我又迷上了美国的阿西莫夫。

尹传红 这两位科普大师的写作风格差异很大，但他们的作品却同样深具魅力、颇受“追捧”，不知您是怎样的感受？

卞毓麟 同意您的看法。我觉得至少是因为这两位科普大师的作品存在着如下的共性。第一，以知识为本。他们的作品都是趣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的，而且这种趣味性永远寄寓于知识性之中。从根本上说，给人以力量的乃是知识。第二，将人类今日掌握的科学知识融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用哲学的语言来说，那就是真正做到了历史的和逻辑

的统一。在普及科学知识的过程中钩玄提要地再现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本来面目，有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的真谛。第三，既讲清结果，更阐明方法。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而且更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更好地启迪思维、开发智力。第四，文字规范、流畅而生动，决不盲目追求艳丽和堆砌辞藻。也就是说，文字具有朴实无华的品格和内在的美。效法伊林或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无疑是不易的，但这毕竟可以作为科普创作实践的借鉴。《星星离我们多远》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它跨出了我在科普创作上凝聚着辛劳甘苦的第一步。此后，我又撰写、翻译了多部科普著作，也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科学短文，题材亦多以天文为主。

他山之石

尹传红 您是迄今所知唯一曾在阿西莫夫家作客的中国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可能还是翻译阿西莫夫科普作品数量最多的中译者。请谈谈您对阿西莫夫作品的总体印象。

卞毓麟 对于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的特色，我本人在20多年前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背景广阔，主线鲜明；布局得体，结构严整；推理缜密，叙述生动；史料详尽，立足前沿；新意迭出，深蕴哲理”。在《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一书的“译者前言”中，我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阅读和翻译阿西莫夫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一种享受。然而，译事无止境，我们常因译作难与作者固有的风格形神兼似而为苦。”

尹传红 在我国，赞赏和喜欢阿西莫夫作品的人很多。《科技日报》首任总编辑、阿西莫夫作品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林自新先生，对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风格独特、轻松易懂、引人入胜，是真正的创作，而不是把科学内容做简单的排列和堆砌。所以，有人把阿西莫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之一”。

卞毓麟 20世纪80年代，我跟阿西莫夫保持着通信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1988年8月

初，我到美国巴尔的摩市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0次大会；会后顺访纽约，于8月13日下午专程拜访了阿西莫夫。

尹传红 我也是个阿西莫夫迷，您的这个经历真是让我羡慕不已。请问：对于中国的科普作家来说，阿西莫夫有哪些值得研究与借鉴之处呢？

卞毓麟 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阿西莫夫乃生物化学家出身，何以能涉足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又何以能写出数以百计的优秀科普书籍和数以千计的科普文章？再如，他的科普作品几乎不必借助于插图，单凭文字的力量就能把科学上许多相当抽象、复杂的概念和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这在当前技术先进国家的书林中，堪称独树一帜；而从我国国情来看，科普书籍不过分倚重大批精美彩照或豪华插图乃是非常可取的。我真诚地希望在中国能够涌现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样富有原创精神的优秀科学作家，也更希望我们能培养出一代超越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文化的传播者。

尹传红 早先，谈起著名的外国科普作家，人们通常总会提到伊林和阿西莫夫。他们对我国的几代读者和科普事业确实影响深远。最近十几年，我感到卡尔·萨根在我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1996年他去世之后，人们还常常提起他、怀念他。您本人对萨根似乎也相当推崇，是吗？

卞毓麟 萨根在孩提时代就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魅力十足，阿西莫夫曾经夸奖他“具有米达斯点物成金的魔力，任何题材一经他手就会金光闪闪”。我觉得萨根作为一名专业天文学家尤为可贵的一点是，他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从未忘记以巨大的热情向社会公众宣传科学。他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在世界范围内也极有名望。他于1980年主持拍摄的13集科学电视系列片《宇宙》曾在全球约70个国家播出，其同名科普图书曾连续70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80多个国家累计销售了500多万册。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在萨根生前一直没能找机会拜访他。不过，我跟他也有过一些通信联系，还曾参与过电视片《宇宙》的译制

工作。后来，我又成了萨根科普名著《暗淡蓝点》以及《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一书的责任编辑。

尹传红 我常听科普界的朋友谈到，作为著名天文学家，萨根的科研成果固然骄人，而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科普作家和科学教育家对社会作出的贡献，看来甚至比前者还要大得多。

卞毓麟 可惜时至今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有不少人无法摆脱这样的偏见：科研人员搞科普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或者认为搞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的人才去搞科普。结果，有些热心于公众理解科学的科学家在社会上虽受尊重，但在周围小环境里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萨根生前就因从事科普宣传而遭到一些同行的轻视与嘲笑，他们甚至认为这有辱于科学家的身份。1992年，萨根曾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但由于某些院士持强烈反对意见，最后他未能获得必须的2/3多数票而落选。萨根逝世后，美国一些一流的天文学家曾直言宣称：即便你不承认萨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你也必须承认他在激发公众对天文学的兴趣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也有人评价说：萨根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在我看来，萨根与阿西莫夫一样，擅长于用生动、形象、简明的语言来向公众介绍科学知识，这对我本人的科普实践也有许多启迪和借鉴。

尹传红 有人打了个比方：普及科学就像去引发原子的链式反应，在无数新思维的撞击下才能聚集知识的能量，创造科学更加辉煌的明天，其最终受益者不仅是公众，更是以空前速度发展的科学本身。

卞毓麟 所以，我热切地盼望我们国家多出现一些像萨根那样视宣传科学为己任的科学家，出现一批像萨根那样杰出的科学宣传家。当然，这并非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像萨根那样投入，但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具备那样的理念、热情和责任感。

尹传红 那么，依您看来，科学普及的“火车头”应该由什么人承当？

卞毓麟 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

是科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当然首先只能由科学家来传布。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我想,你说的“火车头”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有了“发球员”还要有“二传手”,有了“主角”还要有“配角”。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唱好科学宣传这台戏,把科学之球传到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中去。这里我想强调一点:“球”是科学家发出来的,因此科学家们,尤其是著名科学家直接从事科普工作就不仅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而且也是责无旁贷的。

尹传红 这些年来我们的科学家群体确实做了不少科普工作,尤其是自从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更是如此。但从整体上说,也仍有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在科普阵地上身体力行的科学家,在整个科学家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大,和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卞毓麟 我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一再重申自己多年前提出的一项建议,那就是科研项目在结题、鉴定、评奖时,不管有多少项评判指标,都不能缺少这样一项,即“你如何向社会公众宣传、介绍、普及你所从事的这个科研项目的意义和成就”。如果这一条你答不上来,打了零分,那么就要影响到你最后所得的总分。缺少这一条,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我很希望有关各方能有力地推动和实施这项建议。回想1992年10月末,我曾在“亚太地区天文教育研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一开头,我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有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阿西莫夫仿此句型,引出了又一名言:‘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他的意思是说,全社会、全人类都必须切实地关心科学事业。作为一名科学普及事业的热心人,我想这样说:‘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科文交融

尹传红 科普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要有理

论作指导。但我国的科普理论研究似乎落后于科普实践。您在科普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探讨科普理论,您的一些理论文章反响也很不错,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卞毓麟 好的。但首先要指出,实际上我国前辈的科普作家,如贾祖璋、顾均正、高士其、温济泽、叶至善等,都是很关注科普理论研究的,后来者也不乏其人。将近20年前,由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主编的《科普创作概论》一书,就是一部颇有价值的科普理论作品。高士其先生曾为之题词,茅以升先生则为之作序。

我本人涉足于科普理论有十几个年头了。20世纪90年代初,科普尚未走出低谷。当时我提出“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意在阐明科学普及的功能,呼吁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们深切地关注科普事业,并以天文学的普及为例,简述了科学普及的历史经验。1993年3月,上海的《科学》杂志作为特稿刊出了我的这篇随记。1994年6月,中国科协召开“学科发展与科技进步研讨会”,我作了题为“科学宣传——科学家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的发言。7个月以后,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科学宣传”六议》一文,再次作为《科学》杂志特稿刊出。所谓“六议”,即“一议:何为‘科学宣传’”,“二议:科学宣传的目的”,“三议:科学宣传的内容”,“四议:科学宣传的对象”,“五议:科学宣传的主体”,“六议:科学宣传的方法”。此文刊出时,适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下达不久,上述两篇“特稿”自然分外引人注目,并为《新华文摘》等多家出版物转载。

尹传红 记得在中国科普作协工交委员会2001年年会上,您的长篇发言《科普的追求》很受与会者们的欢迎,后来好像也正式发表了?

卞毓麟 是的,还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放在“论坛”栏目中,时间是2002年1月,题为《“科普追求”九章》。后来,《科普创作通讯》对此作了删改,于2002年6月刊出。

尹传红 在适合一般社会公众——当然以成人为主——阅读的科普类作品中,有一类常

被称为“科学人文”。近年来，言必称“科学人文”似乎已经成为“时尚”。记得您在10多年前就经常使用“科学文化”这种说法，请问这两者有何异同？

卞毓麟 抽象地谈论概念，会令人觉得空泛乏味。多看具体的作品，才能找到感觉。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我认为“科学人文”和“科学文化”两种提法可称一脉相承、大同小异。

尹传红 《梦天集》的第三编“科文交融”收入科学文化类短文9篇。科文交融，是科学与文化的汇合，其精神实质是很明白的。“科文交融”中的诸篇文章我都很喜欢，它们与通常所说的“科学文艺”（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区别。

卞毓麟 事实上，在为《天文爱好者》写那一系列“天文趣谈”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科文交融的尝试。第一篇是1979年7月发表的《光环趣谈》，接着是1980年1月的《日食趣谈》，3月的《毅力·小行星·火卫的发现》，8月的《大行星命名趣谈》，9月的《聋哑人探魔星有志不在年高》……到1987年5月的《和谐与不和谐——开普勒外篇》，一共在《天文爱好者》上发表了30篇这样的作品。1986年，《科技日报》的前身《中国科技报》创办《文化》副刊，一些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共同倡议将“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作为办刊要旨之一。为什么这样考虑呢？因为大家觉得，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的东西显得太单薄了。因此，应该有意识地把科学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去。后来，又有了精神实质相同的另一种提法，即“在大文化的框架里融进科学的精华”。1986年1月8日，《中国科技报》（《科技日报》的前身）的《文化》副刊发表了赵之先生起草的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办文化副刊”，明确提出：要“以科学为准绳，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在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

尹传红 多年后我也听赵之先生提到，他在《科技日报》建议和创办的副刊和专版《科学》、《文化》、《生活》、《读书》等，除各自的特殊要求外，作为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服

从这样一个总的编辑思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是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我们应当了解它；科学技术又是现代社会文化的脊梁，社会文化的进步需要我们的关心和推动。因此，我们的读者也只有取得一个高视角，来鸟瞰科技发展所置身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才能认识当今时代的变革，并有效地在变革中求得发展。

卞毓麟 确实很有道理。1991年，《科技日报·星期刊》开辟“三原色”专栏，旨在发表融科学、文化与社会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短文。1994年，《星期刊》开辟以科学与文化交汇为目的的新专栏“葫芦居随笔”。1995年，《星期刊》改为《社会文化周刊》。我先后在这些刊、栏发表科学文化作品30余篇，《梦天集》第三编选收的文章多属此列。一些从事文学的朋友对这些文章的反映是“有点儿意思”，我想这就是良好的开端。只要坚持做下去，科文交融便有望渐成气候。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搞“短平快”。

尹传红 听了您的这一番话，我想很冒昧地用8个字来概括您的所思所为，那就是：“科学情结、人文关怀”，未知可否？

卞毓麟 谢谢美誉，但又想补充一句：如今我身为出版工作者，按理说很应该具备“市场意识、经济头脑”。但是，很可惜，这不是我的强项。

尹传红 最近您又有什么新的尝试？

卞毓麟 我开始试着写一些“科文交融”特色更加鲜明的文章。例如，最近在《天文爱好者》上分4次连载的《霍金的人生和宇宙》，以及即将连载的《潇洒说彗星》等。我自信，读者将会觉得这些文章确实都很“好看”。

尹传红 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习、研究、写作、翻译、讲演、编辑……在这漫长的科学文化之旅中，似乎从来也不肯停下奋进的脚步。我不禁要问：您有没有过悲观失落、心灰意懒的时候？

卞毓麟 总的说来，我性情是乐观的。多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一生中碰到的困难不少，但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要悲观失落、心灰意懒。我老是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惜经常顾此失彼，总是做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岁

月匆匆,回想起来,家里人总是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我和家人共享生活的时间却似乎少了些。所以您看,去年才下定决心偕妻儿在欧洲“悠闲”了两个月。常有人问我治学和写作之道,我的回答是16个字:“分秒必争,一丝不苟;博览精思,厚积薄发”。我也希望今天的年轻人都努力这样做……时间是宝贵的,一个人的生命因其智慧和业绩而赢得质量,有质量的生活则等于延长了寿命。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为公众奉献的田野中耕

耘。我愿与读者诸君共勉,学习前贤先师们的精神,为科教兴国而奋进,使人类文明的科学之花开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纵非如愿以偿,亦当尽力而行!”

作者简介

尹传红,《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副主编,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Email: asimov19790319@yahoo.com.cn

• 简 讯 •

2006 科学文化与科学普及优秀图书年度推荐活动结果揭晓

《科学时报·读书周刊》2006 科学文化优秀图书年度推荐活动于 2007 年 1 月 14 日在京揭晓。2006 科普佳作共评出《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浓烟似水》、《宇宙逍遥》、《失窃的收成》、《礼物还是灾难》、《人体使用手册》等 15 本科普佳作,以及科幻作品奖“潘家铮科幻作品全集”,丛书奖“生物学家谈生物”、视觉奖《野生动物生活实录——狮子》等 5 个单项奖。

“老金笔”奖授予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先生,今年首次设立的“科学文化出版人奖”则授予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潘涛,他近年来编辑策划的“哲人石丛书”、“普林斯顿科学文库”、“八面风文丛”、《技术史》、《竺可桢全集》等知名图书在国内的科学文化类图书市场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